

共同富裕专题

##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 区域差异与收敛趋势

李 根 李腾飞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依循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及外在特征，从富裕性、共享性以及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评价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对中国2008—2022年间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深入探究了中国共同富裕的区域分布特征以及动态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考察期中国共同富裕综合指数增长12.34%，反映出中国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与提升。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产业结构承压显著，对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带来一定挑战。中国共同富裕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其中，在富裕性维度区域差距最大，在共享性维度区域差距最小。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空间总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为区域内差异，二者在疫情期间的波动性均显著增加。从收敛趋势来看，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发展均表现出典型的收敛特征，其中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是共同富裕向高水平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为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提供了辅助决策支持。

**关键词：**共同富裕 共享性 可持续性 区域差距 区域协调

**作者简介：**李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博士后；李腾飞，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5)01-0053-30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旨在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福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远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了重大部署，要求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提出到 2035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要求。2021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当前，中国已迈入“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已经成为这一阶段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现阶段中国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绝对贫困已成功消除。<sup>①</sup> 共同富裕要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共同富裕的监测评估问题<sup>②</sup>，二是共同富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sup>③</sup>。首先，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合理制定共富政策并对政策效果进行科学评估，这就要求不能再将共同富裕视为一种理念，而是开辟出一个既能真实反映中国共同富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又能进行横纵向比较的量化方法。实现对共同富裕的科学监测与评估，不仅能够客观反映中国面向 2035 年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执行情况，而且有助于发现问题与挑战，并汲取全国各地推动共享繁荣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指引。在实质性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还必须围绕解决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让全体人民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2022 年 10 月，习总书记在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坚定决心，也为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显著，这不仅体现在 GDP 总量和人均水平上<sup>④</sup>，还反

① 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20 年第 6 期，第 21—36 页。

② 陈宗胜、杨希雷：《论中国共同富裕测度指标和阶段性进展程度》，载《经济研究》，2023 年第 9 期，第 79—97 页。

③ 洪银兴：《区域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载《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6 期，第 3—10 页。

④ 李实、朱梦冰：《中国经济转型 40 年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载《管理世界》，2018 年第 12 期，第 19—28 页。

映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sup>①</sup>。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不仅影响着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也对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的同时，必须解决好地区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目前，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内涵、共享发展以及政策研究等定性分析方面。然而，共同富裕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可以对其进行监测评价<sup>②</sup>。要推动共同富裕实质性前进，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多维度 and 全方面的科学评估。尽管已有少数学者尝试量化评估共同富裕，但这些研究大多限定在2020年之前的数据。鉴于2019—2022年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经济波动，有必要将涵盖这一特殊时期的全周期纳入研究视野，以深入理解疫情和国际贸易冲突如何影响中国各区域共同富裕的差异变化。此外，现有研究在分析地区差异时往往局限于静态的比较，缺乏对不同地区间共同富裕演进过程和收敛性的动态研究，这使得现有研究难以全面反映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区间的演变趋势和特征，也难以提供有效的策略。

鉴于此，本文首先在对共同富裕本质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的共同富裕测度框架，该框架下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涉及富裕与共享两个层面，还涵盖了诸如经济结构、绿色生态以及风险管控等可持续发展的多维因素，从而构建出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为深入掌握共同富裕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特征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随后，本文将研究范围拓展到2022年，通过熵权TOPSIS法对中国30个省份（地区）2008—2022年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揭示出中国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地区间的差异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新冠疫情期及中美贸易摩擦对各区域共同富裕的走势及区域均衡发展的波动性影响。这有助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统筹规划，平衡各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的发展差异，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在全国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落实。最后，本文通过构建收敛模型将共同富裕的研究范式从传统的区域间静态比较转向动态演进的分析，这不仅是理解共同富裕动态发展过程的关键，也为揭示不同地区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相对速度和趋

<sup>①</sup> 房连泉、周佳玲：《基本养老保险实际费负：基于地区差异和就业结构的实证分析》，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1—18页。

<sup>②</sup> 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载《统计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7页。

同性提供了新的视角。该分析旨在为识别和理解地区间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和收敛路径提供精确工具，进而为政策制定者全面评估和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政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 一 内涵界定与指标体系构建

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确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这是构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要实现对共同富裕的监测评估，须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应全面反映共同富裕的多方面特征，不仅需要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还应涵盖社会公正及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以促进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和精准性。

###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界定

共同富裕具有多维属性，准确把握其本质内涵是科学评估共同富裕的前提。习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可见，共同富裕的直观特征突出表现在富裕和共享两大维度。<sup>①</sup>其中，富裕反映了物质财富的发展与积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折射；共享反映了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折射。<sup>②</sup>因此，对共同富裕本质内涵的理解需要回归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首先，生产力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如张光先和钟晓敏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起点与前提。<sup>③</sup>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单位劳动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改善民生、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物质基础。<sup>④</sup>生产力的提升同时也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直接关联到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是缩小收入差距、推动财富更公平分配的关键。其次，生产力的发展还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

<sup>①</sup> 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载《管理世界》，2022 年第 1 期，第 52-61 页。

<sup>②</sup> 周文、施炫伶：《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 年第 3 期，第 3-23 页。

<sup>③</sup> 张光先、钟晓敏：《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进路》，载《财经论丛》，2023 年 12 期，第 24-34 页。

<sup>④</sup> 邱海平：《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 年第 4 期，第 21-26 页。

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为广大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元和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这种产业转型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社会福利水平，还能够促进社会劳动力的再分配，使更多人受益于经济发展成果，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可见，共同富裕依托于生产力的持续增进，其本身也是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直接映射。

然而，生产力的提升并不自动等同于共同富裕，还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确保生产力的增长能够惠及社会各阶层，包括就业机会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等。<sup>①</sup> 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生产关系之上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成员间的经济联系，是决定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关键因素。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到财富的创造、分配和再分配机制，进而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sup>②</sup> 一方面，生产关系决定了个体和集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影响着他们获取经济成果的能力。一个平等和公正的生产关系体系能够确保更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经济增长中并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演化反映了社会对于公平和正义的不断追求，这种追求驱动着政策制定者调整经济政策，优化分配机制，以期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共同富裕的实现是生产关系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写照。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生产关系，促进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高生产效率和公平性，才能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综合而言，共同富裕本质上体现为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进步的有机统一，其中生产力的解放与提升须与生产关系的持续优化相辅相成。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相互作用和适应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是发展状态和发展过程的统一，是当前和长远的统一。这就要求共同富裕的推进要与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不能超出社会支撑能力，即共同富裕必须是可持续的。可持续性对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在于它确保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保证当前的经济活动不会损害未来世代的福祉，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sup>①</sup> 万海远、陈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载《财贸经济》，2021年第12期，第18-33页。

<sup>②</sup> 乔晓楠等：《共同富裕与重塑中国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载《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第5-23页。

## (二)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共同富裕指标评价体系是理解和实质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关键，这一体系不仅可以提供评估共同富裕进程的工具，而且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多维度特征和内在联系。现有学者普遍从富裕性和共享性两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衡量。例如，彭刚等认为测度共同富裕必须将收入水平置于最核心的地位，其中收入的高低反映了富裕的水平，收入的分配反映了共同性的水平，并以此为出发点，从富裕水平、共同水平两个维度构建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sup>①</sup>孙豪等指出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特征，共享是其本质特征，并以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为一级指标构建出县域共同富裕指标体系。<sup>②</sup>整体而言，从富裕性和共享性两个维度可以较好地揭示出共同富裕在某阶段的综合水平。然而，共同富裕不是静止的，是与财富积累和共享有关的动态过程，而非某一时刻的静态结果。<sup>③</sup>郁建兴和任杰指出共同富裕是发展、共享以及可持续三者的统一<sup>④</sup>，仅仅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部分学者在富裕性和共享性两大指标的基础上，对指标体系做了进一步延伸。如徐振宇等认为，共同富裕是高度重视托底性的富裕，其在富裕性、共享性的基础上加入托底性维度，并从低收入群体基本福祉和农村居民相对获得感两方面进行评估。<sup>⑤</sup>与之相似，徐菁认为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是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对共同富裕的评价应突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惠及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其在指标构建中额外加入弱势保障维度，包括低收入保障以及农村保障两个方面。<sup>⑥</sup>此类做法突出了共同富裕在消除两级贫困层面的内涵特征。然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托底一定程度上是共享的范畴，额外构建指标易造成

① 彭刚等：《中国城市共同富裕水平测度、空间特征与动态演进》，载《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S1期，第289-303页。

② 孙豪等：《浙江县域共同富裕的测度、评价及区域分异》，载《经济地理》，2024年第8期，第97-105页。

③ 罗明忠：《共同富裕：理论脉络、主要难题及现实路径》，载《求索》，2022年第1期，第143-151页。

④ 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3期，第13-25页。

⑤ 徐振宇等：《我国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基于省级行政区与区域层面的探讨》，载《统计研究》，2024年第3期，第3-17页。

⑥ 徐菁：《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1期，第129-138页。

指标混乱与重复。此外，还有少数学者从更多维指标来衡量共同富裕程度，它们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如郭卫军和张衔春从生产效率、总体富裕、协调发展、成果共享以及生态福利五个维度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体系。<sup>①</sup>程冲等从生产力、发展机会、收入分配、发展保障以及人民福祉五个维度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综合评价。<sup>②</sup>虽然指标越多似乎越能紧扣发展的内涵逻辑，但过多的指标不仅会导致指标之间关系复杂，而且这种划分方式一定程度上有混淆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嫌疑，与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及现实逻辑相悖。

指标选取的好坏直接决定共同富裕量化方法的合理程度。对于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回溯到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本文认为共同富裕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动态统一，这不仅表现在富裕和共享两大层面，还强调这种共享繁荣的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富裕、共享两大核心指标，将可持续性纳入共同富裕的研究范式。特别地，本文认为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生态环境上，还表现在经济结构的可持续以及企业、政府对风险的管控上，因此，文章从经济结构、绿色生态以及风险管控三个维度对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进行考察。具体地，本文在遵循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以及强客观性等原则的基础上，构建起包含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以及28个三级指标在内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针对富裕程度的评估，本文从生产力水平、财富丰裕度以及公共服务质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其中，生产力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指标，直接关系到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和经济的整体实力。陈丽君等学者指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高效的生产力水平是实现物质富裕的前提与保障。<sup>③</sup>本文以地区经济发展、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个方面来反映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较于社会生产发展，财富丰裕度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财富状况和生活水平，是评价经济成果是否普惠于民的关键指标。李金昌和余卫将共同富裕视为由物质富裕向其他

<sup>①</sup> 郭卫军、张衔春：《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测度与区域时空差异研究》，载《经济问题探索》，2023年第4期，第1-24页。

<sup>②</sup> 程冲等：《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异测度、来源分解及形成机理》，载《统计与决策》，2023年第17期，第10-16页。

<sup>③</sup> 陈丽君等：《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构建》，载《治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5-16页。

领域延伸扩展的过程。<sup>①</sup>可见,共同富裕作为脱离绝对贫困的社会阶段,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其重要评价标准。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恩格尔系数以及人均住房面积作为衡量财富富裕度的关键指标。对共同富裕来说,基本公共服务同样是衡量富裕程度的重要维度。<sup>②</sup>公共服务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和政府职能发挥的重要尺度。<sup>③</sup>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提升民众的生活满意度,还能促进社会公平和谐,为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本文从人均受教育年限、医疗设施完善度、文化娱乐设施完善度以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完善度四个方面来考察基本公共服务水准。

共同富裕不仅仅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成果的普惠性。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人群间收入分配差距较大。<sup>④</sup>刘培林等学者强调共同富裕是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以及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群协调的发展。<sup>⑤</sup>鉴于此,本文从人群收入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三个层面对共享程度进行评估。其中,人群收入差距反映了社会成员在经济成果中的分享程度,是衡量经济公平性的直观指标。较小的人群收入差距意味着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地区差距则反映了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这套评价指标体系是围绕省级层面展开的,所以此处的地区差距主要特指省份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城乡差距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鉴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异显著,明确城乡差别指标,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共同富裕的实施效果和进度。<sup>⑥</sup>

① 李金昌、余卫:《共同富裕统计监测评价探讨》,载《统计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7页。

② 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载《经济研究》,2021年第11期,第4-13页。

③ 苏曦凌:《公共服务助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106-115页。

④ 尹志超、文小梅、栗传政:《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第109-127页。

⑤ 刘培林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载《管理世界》,2021年第8期,第117-129页。

⑥ 杨大鹏:《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和对策》,载《中国软科学》,2022年第S1期,第71-75页。

表1 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子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衡量方式	功效	
富裕性	生产力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全员劳动生产率	GDP/年末就业人员数	+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	
	财富丰裕度	人均可支配收入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常住人口	+	
		恩格尔系数	食品消费支出/总消费支出	-	
		人均住房面积	房屋销售面积/年末常住人口	+	
	公共服务质量	人均受教育年限	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	
		医疗设施完善度	医疗机构床位数/每万人口	+	
		文化娱乐设施完善度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完善度	每平方公里公路铁路里程	+	
	共享性	人群收入差距	收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
			低收入贫困人群占比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年末常住人口	-
行业工资分配差距			按行业划分的职工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之比	-	
地区差距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地级市间人均GDP最高与最低之比	-	
		地区间社会消费差距	地级市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最高与最低之比	-	
		地区间基本社会保障差距	地级市间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最高与最低之比	-	
城乡差距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年末常住人口	+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泰尔指数	-	
		城乡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反差指数	-	
可持续性	经济结构	就业波动性	城镇登记失业率	-	
		消费者物价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产业结构合理化	泰尔指数倒数	+	
	绿色生态	能源消耗强度	能源消费总量/GDP	-	
		绿色生活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环境治理水平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工业总产值	+	
	风险管控	企业偿债能力	企业流动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之比	+	
政府财政自给率		政府一般预算内收入/一般预算内支出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针对可持续性的衡量, 本文从经济结构、绿色生态以及风险管控三个层面对可持续性进行刻画。其中, 经济结构是衡量经济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 一个多元化、高效率的经济结构不仅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的增长, 还可以有效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持续发展。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现阶段中国依旧面临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破坏的根源性问题, 传统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要求, 而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sup>①</sup> 因此,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是评估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此外, 风险管控同样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应对机制能够减少突发事件对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 保障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也是共同富裕可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参考指标。

### (三)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模型与方法

(1) 共同富裕综合水平的测度。本文在构建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 通过熵权 TOPSIS 法<sup>②</sup>对各指标赋权并测算各省份共同富裕的综合水平。该方法实现了对各测度指标的客观赋权, 同时通过与最优最劣方案相对距离的量化比较, 保证了各地区共同富裕综合水平测度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具体测算步骤如下。

由于不同指标在数量级与量纲上存在差异, 本文首先通过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Y_{ij} = \begin{cases} \frac{X_{ij} - \min(X_{ij})}{\max(X_{ij}) - \min(X_{ij})}, X_{ij} \text{ 为正向指标} \\ \frac{\max(X_{ij}) - X_{ij}}{\max(X_{ij}) - \min(X_{ij})}, X_{ij} \text{ 为负向指标} \end{cases} \quad (1)$$

其中,  $X_{ij}$ 、 $Y_{ij}$  分别表示  $i$  省份  $j$  测度指标标准化前后指标值。在消除量纲后, 考虑到不同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影响程度不同,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指标  $Y_{ij}$  的信息熵  $E_j$  和权重  $W_j$ , 形成加权矩阵  $R$ :

$$E_j = \ln \frac{1}{n} \sum_{i=1}^n [(Y_{ij} / \sum_{i=1}^n Y_{ij}) \ln (Y_{ij} / \sum_{i=1}^n Y_{ij})] \quad (2)$$

<sup>①</sup> 郑石明等:《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理论阐释与实证研究》, 载《政治学研究》, 2022年第2期, 第52-65页。

<sup>②</sup> 马玉林等:《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载《宏观经济研究》, 2020年第7期, 第124-137页。

$$W_j = (1 - E_j) / \sum_{j=1}^m (1 - E_j) \quad (3)$$

$$R = (r_{ij})_{n \times m}, r_{ij} = W_j \times Y_{ij} \quad (4)$$

其中,  $r_{ij}$  为加权后各测度指标的加权指数。在此基础上, 计算各测度方案与最优方案  $Q_j^+ = (\max r_{i1}, \max r_{i2}, \dots, \max r_{im})$  及最差方案  $Q_j^- = (\min r_{i1}, \min r_{i2}, \dots, \min r_{im})$  的欧氏距离  $d_i^+$ 、 $d_i^-$ :

$$d_i^+ = \sqrt{\sum_{j=1}^m (Q_j^+ - r_{ij})^2}, d_i^- = \sqrt{\sum_{j=1}^m (Q_j^- - r_{ij})^2} \quad (5)$$

最后, 测算接近度  $C_i = d_i^- / (d_i^+ + d_i^-)$ , 用来比较所选方案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将时间考虑在内, 通过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便可得到面板数据  $C_{it}$  (介于 0 与 1 之间)。该值越大, 表明该地区在  $t$  年共同富裕的综合水平越高, 反之, 综合水平越低。

(2) 区域差异来源的分析。本文利用达古姆基尼系数 (Dagum Gini Coefficient) 及其分解<sup>①</sup>对共同富裕空间差异化的来源进行识别。总体基尼系数  $G$  定义如下:

$$G = \frac{1}{2n^2\mu} \left( \sum_{i=1}^n \sum_{r=1}^n |y_i - y_r| \right) = \frac{1}{2n^2\mu} \left( \sum_{j=1}^k \sum_{h=1}^k \sum_{j=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 \right) \quad (6)$$

其中,  $k$  为划分区域总数,  $j$  ( $h$ ) 表示某具体区域,  $n$  为省份总数,  $i$  ( $r$ ) 表示区域内对应的某具体省份,  $y$  代表共同富裕综合水平,  $\mu$  为共同富裕的平均水平。达古姆基尼系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差异  $G_\omega$ 、区域间差异  $G_{nb}$  和超变密度  $G_t$ , 分别用以衡量区域内不平衡、区域间不平衡以及区域间的跨越变异强度对总体差异的贡献, 用公式表示为:  $G = G_\omega + G_{nb} + G_t$ , 其中  $G_\omega$ 、 $G_{nb}$  和  $G_t$  的表达式分别为:

$$G_\omega = \sum_{j=1}^k G_{jj} p_j s_j \quad (7)$$

$$G_{nb}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D_{jh} \quad (8)$$

$$G_t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1 - D_{jh}) \quad (9)$$

其中,  $p_j = n_j/n$ ,  $s_j = n_j \mu_j / n \mu$ ,  $j=1, 2, \dots, k$ ,  $D_{jh} = (d_{jh} - p_{jh}) / (d_{jh} + p_{jh})$

<sup>①</sup> C. Dagum,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 Heidelberg: Physica - Verlag HD, 1998, pp. 47 - 63.

用以衡量  $j$ 、 $h$  地区共同富裕发展的相对影响， $d_{jh}$  为两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差值， $p_{jh}$  为  $y_{hr} > y_{ji}$  下样本的加权平均值。

(3) 收敛性特征检验。 $\beta$  收敛是收敛模型中的经典方法，常用以考察落后地区以较快速度追赶先进地区的趋同态势。 $\beta$  收敛分为绝对  $\beta$  收敛和条件  $\beta$  收敛，其中，绝对  $\beta$  收敛是建立在外界因素不变条件下的收敛，条件  $\beta$  收敛则是在充分考虑外界影响因素条件下的收敛。绝对  $\beta$  收敛与条件  $\beta$  收敛的模型表达式分别为：

$$\ln(CP_{i,t+1}/CP_{i,t}) = \alpha + \beta \ln(CP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0)$$

$$\ln(CP_{i,t+1}/CP_{i,t}) = \alpha + \beta \ln(CP_{i,t}) + \gamma X_{it}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其中， $CP_{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期共同富裕的综合水平， $\ln(CP_{i,t+1}/CP_{i,t})$  表示该地区在  $t+1$  期共同富裕水平的增长率。 $\beta$  为收敛系数，若  $\beta < 0$ ，则表示  $\ln(CP_{i,t})$  与  $\ln(CP_{i,t+1}/CP_{i,t})$  呈反向变动关系，此时共同富裕初始水平越低，后期提升速度越快，从而呈现出收敛的发展态势；若  $\beta > 0$ ，则表明各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呈现出发散性态势，此时不存在  $\beta$  收敛。 $X_{it}$  为控制变量，文中主要涉及科技创新投入 ( $rd_{i,t}$ )、产业结构高级化 ( $idstr_{i,t}$ )、市场化进程 ( $mkstr_{i,t}$ ) 以及对外开放 ( $open_{i,t}$ ) 等， $\mu_i$  与  $\nu_t$  分别代表共同富裕的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此外，由  $\beta$  收敛系数可计算出各地区在考察期  $T$  内共同富裕指数的收敛速度  $s$ ，具体表达式如下：

$$s = -\frac{1}{T} \ln(1 - |\beta|) \quad (12)$$

#### (四)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的构建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收集了 2008—2022 年中国 30 个省份（不含西藏、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与共同富裕相关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sup>①</sup> 数据来源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指标来源于《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恩格尔系数测算过程中的食品消费支出指标、房屋销售面积指标、每平方公里公路铁路里程指标和行业平均工资差距指标均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省级市人均 GDP 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北

<sup>①</sup> 本文对 30 个省份的区域划分参照《2009 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计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计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共 11 个省份。

京与天津相关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上海数据来源于《上海经济年鉴》，重庆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省地级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省地级市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指标则主要来源于 EPS 数据库；其余指标数据均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获取。

## 二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分析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下，准确测量和全面理解全国及各省份在共同富裕实现方面的进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评估的基本要求。通过系统地测度全国与省级的共同富裕水平，可以揭示各地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成就与挑战，为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奠定基础。

### （一）全国层面的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各地区 2008—2022 年间共同富裕水平进行量化测度，表 2 是全国共同富裕指数及其分解指标的测度结果。2008—2022 年间全国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取值介于 0.2717 ~ 0.3131，中位数介于 0.2811 ~ 0.2296，考察期整体呈现出逐步增长的发展态势。其中，2022 年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取值 0.3100，较 2008 年增长了 11.38%，中位数增幅则达到 14.65%。这一积极变化反映了政策调整和结构优化所带来的成效，凸显了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在扩大社会福利、提高生活标准以及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从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值的走势看，得益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完善，2008—2019 年间共同富裕指数以年均 1.14% 的增速持续提升，期间增幅达到 11.98%。2020—2022 年间共同富裕指数迅速提升的势头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经济增长放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新挑战。事实上，这期间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对中国经济活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对服务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冲击直接影响了就业和居民收入水平。此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产业由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与平均值的走势相比，共同富裕中位数的走势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特别是 2020—2021 年间共同富裕指数依旧保持了较高的提升态势。可见，新冠疫情以及外部环境的恶化并未对中国共同富裕的整体发展带来根本性影响。鉴于平均值与中位数走势呈现的差异，本文通过对各省份共同富裕指数筛查，发现 2020—2022 年阶段北京、上海等共同富裕发展较好的

头部地区受到的外部冲击较为明显，而以云南、广西、青海、甘肃等共同富裕相对滞后地区受到的冲击反而相对较小。

表 2 全国层面共同富裕指数与各分解指标的测度结果

年份	共同富裕		富裕性		共享性		可持续性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2008 年	0.2783	0.2307	0.2379	0.1918	0.5011	0.5083	0.2689	0.2285
2009 年	0.2855	0.2523	0.2368	0.1887	0.5113	0.515	0.2942	0.2781
2010 年	0.2717	0.2296	0.2391	0.1882	0.4832	0.4857	0.2412	0.2091
2011 年	0.2853	0.2367	0.2481	0.1934	0.4890	0.4971	0.2619	0.2291
2012 年	0.2892	0.2412	0.2460	0.1798	0.4842	0.4603	0.2701	0.2326
2013 年	0.2999	0.2491	0.2556	0.1975	0.4955	0.4978	0.2903	0.2497
2014 年	0.2840	0.2402	0.2667	0.2153	0.4820	0.4861	0.2442	0.2039
2015 年	0.2992	0.2552	0.2574	0.1955	0.4831	0.4869	0.2884	0.2402
2016 年	0.2943	0.2454	0.2605	0.2100	0.4678	0.4439	0.2727	0.2399
2017 年	0.2988	0.2564	0.2650	0.2054	0.4980	0.4892	0.2841	0.238
2018 年	0.3117	0.2631	0.2670	0.2062	0.5146	0.5039	0.3076	0.2832
2019 年	0.3131	0.2645	0.2790	0.2286	0.5284	0.5396	0.2825	0.2337
2020 年	0.3128	0.2746	0.2865	0.2375	0.5057	0.4911	0.2512	0.2166
2021 年	0.3113	0.2811	0.2897	0.2361	0.5224	0.5325	0.2656	0.2307
2022 年	0.3100	0.2645	0.3076	0.2551	0.5212	0.5277	0.2475	0.2083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从共同富裕的分解指标来看，2008—2022 年富裕性指数的平均值实现了 29.34% 的增幅，中位数涨幅达 33%，是共同富裕三大分解指标中增速最快、提升幅度最高的指标。这一趋势反映出国家经济力量和居民富裕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早期阶段实施的“先富带动后富”策略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事实上，在夯实经济基础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sup>①</sup> 作为这种发展思想的直观体现，共享指数考察期内平均得分始终在 0.4678 ~ 0.5284 范围波动，中位数则介于 0.4439 ~ 0.5396，是共同富裕

<sup>①</sup> 范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载《经济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23 - 25 页。

三大分解指标中平均得分最高的指标。从可持续性维度看，可持续指数表现出显著的两阶段特征，其中在 2019 年之前可持续指数呈现出逐步提升的发展趋势，2019 年之后可持续指数转为下降趋势。结合富裕维度与共享维度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共同富裕发展在 2020—2021 年间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主要来自于持续性层面。为此，我们通过对二、三级指标进行逐层挖掘，发现可持续性的这种转变主要来源于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变化。这背后潜在的原因主要涉及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活动暂停和全球供应链中断，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生产和消费，而中美贸易战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重构使一些产业链环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部分产业发展受阻。<sup>①</sup>此外，这一时期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政策的推行使短期内一些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的传统产业受到了一定冲击。虽然短期内这会带来产业转型阵痛，但这一转变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产业升级和绿色投资的增加不仅将促进新产业的兴起和新职业的创造，使经济增长更加多元化，推动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还会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改善空气质量，实现经济与生态环保的协同发展。

## （二）省级层面的测算结果分析

为更好地考察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的差异，本文借鉴魏敏和李书昊的研究思路<sup>②</sup>，以  $E + SD/2$ 、 $E$ 、 $E - SD/2$  为门槛（ $E$  为平均值， $SD$  为标准差），将各省份划分为领先型、进步型、追赶型和落后型，明确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所处阶段及特征，有助于国家、各省份根据地区发展差异统筹规划，提升共同富裕政策措施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表 3 反映了 2008—2022 年间中国 30 个省份共同富裕的平均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共同富裕指数介于 0.1829 ~ 0.6602，排名最高的上海约是排名最低的云南的 3.61 倍。事实上，上海、北京作为共同富裕水平最高的地区，二者共同富裕指数得分普遍在 0.63 之上，而排名第三的天津却不足 0.48，可见共同富裕发展存在“头部效应”。此外，30 个省份共同富裕指数平均值为 0.2963，高于该平均水平的省份共 9 个，占比仅 30%，反映出中国省域层面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普遍不高。

全国 30 个省份中处于领先型的省份有 6 个，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

<sup>①</sup> 余振等：《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 年第 7 期，第 24—42 页。

<sup>②</sup> 魏敏、李书昊：《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年第 11 期，第 3—20 页。

江、江苏和广东，这些省份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为其他省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通过对分解指标的比较，可知这些省份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领先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江苏、浙江和广东作为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它们在富裕维度排名均位于全国前列。这不仅意味着这些地区的资源和财富总量较大，也表明了它们在创新能力、高技术产业发展以及社会高质量服务等方面的领先地位。其次，经济成果的普惠与共享是这些省份共同富裕实践中的另一重要方面。相较于其他省份，这些地区的收入分配更为合理，城乡、地区发展差距也相对较小，尤其是天津和上海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同时实现了更广泛的收入共享。最后，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推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上海、北京等地区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时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绿色生态建设，普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的绿色高质量发展，这为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注入动能。

处于进步型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福建、重庆和山东，这类省市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领先型省份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发展空间。事实上，这三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产业特色，如福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重庆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山东的海洋经济等。然而，这些省份在高端产业集群和创新能力方面发展相对较弱，这限制了它们在物质富裕和生活质量提升上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与福建、山东相比，重庆在共享指数和可持续指数方面的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位列全国第16位和第24位，这揭示了其在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挑战。

处于追赶型的省份有10个，分别为宁夏、辽宁、湖北、内蒙古、海南、山西、黑龙江、河南、陕西和江西，这些省份的共同富裕指数低于全国平均值，反映出在经济建设、社会共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不足。具体来看，这些省份往往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或传统工业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支撑高水平的物质富裕和生活质量提升。例如，黑龙江、内蒙古和山西丰富的自然资源，河南和江西深厚的农业基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石，但同时也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地区普遍存在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缩小差异，如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但在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共享方面仍需加大努力。

处于落后型的省份有 11 个，包括湖南、安徽、河北、四川、吉林、新疆、贵州、甘肃、青海、广西和云南。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市场成熟度等诸多限制，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物质富裕和生活质量提升的速度缓慢。同时，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诸如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实施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等措施，但短期内无法有效改善发展的巨大差距。在落后型省份中，河北是唯一的东部省份，显然该省份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与其所处地区平均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由于河北历史上工业结构偏重于传统制造业和重工业，这种依赖重工业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对资源的非持续利用已经成为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河北省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挑战，这些因素导致了河北省在经济增长速度、产业创新能力以及高附加值产业发展等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具有较大差距。

表 3 省域层面共同富裕指数与各分解指标的测度结果

地区	共同富裕	富裕性	共享性	可持续性	地区	共同富裕	富裕性	共享性	可持续性
北京	0.6372	0.6879	0.6806	0.5586	河南	0.2417	0.2229	0.4297	0.2064
天津	0.4784	0.4627	0.7172	0.4360	湖北	0.2652	0.2552	0.5007	0.2072
河北	0.2263	0.1523	0.4974	0.2175	湖南	0.2357	0.2153	0.4540	0.1956
山西	0.2531	0.1740	0.4625	0.2861	广东	0.4077	0.4498	0.5690	0.2975
内蒙古	0.2633	0.2247	0.4808	0.2414	广西	0.1838	0.1072	0.3970	0.1973
辽宁	0.2762	0.2678	0.5487	0.1967	海南	0.2547	0.1593	0.5038	0.2881
吉林	0.2201	0.1815	0.5052	0.1693	重庆	0.2993	0.3245	0.4963	0.2022
黑龙江	0.2450	0.1639	0.5693	0.2350	四川	0.2231	0.1917	0.4442	0.1875
上海	0.6602	0.7023	0.7157	0.5977	贵州	0.2117	0.1395	0.3530	0.2416
江苏	0.4114	0.4584	0.5857	0.3044	云南	0.1829	0.1096	0.3265	0.2156
浙江	0.4555	0.4243	0.6363	0.4499	陕西	0.2416	0.2009	0.4866	0.2173
安徽	0.2344	0.2048	0.4374	0.2133	甘肃	0.2062	0.0964	0.3247	0.2692
福建	0.3466	0.3439	0.5866	0.2901	青海	0.1907	0.1330	0.4215	0.1772
江西	0.2396	0.1772	0.5154	0.2247	宁夏	0.2865	0.2115	0.4422	0.3299
山东	0.2985	0.2785	0.5438	0.2576	新疆	0.2135	0.1650	0.3432	0.2303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 三 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明确全国及各省份共同富裕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识别共同富裕在

空间维度的分布格局与区域差异，可以更精确地评估和调整区域发展策略，从而强化地区间的互补性，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增长，确保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更加公平和广泛。

### （一）共同富裕的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省域共同富裕并非均衡分布。为了更好地展示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运用 ArcGIS10.8 软件对中国共同富裕的分布特征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见图 1），其中，X 轴方向代表正东方向，Y 轴方向代表正北方向，Z 轴代表共同富裕水平。从 X 轴方向来看，2008 年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呈现出由西向东逐步提升的空间特征，这种“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在 2022 年更加显著，反映出共同富裕在东西维度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拉大。从 Y 轴方向来看，2008 年中国共同富裕呈现出“倒 U 型”分布，即在南北维度，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要普遍高于南方与北方，2022 年共同富裕的这种“倒 U 形”分布口由“南低北高”转变为“南高北低”，可见，考察期内南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得到极大发展与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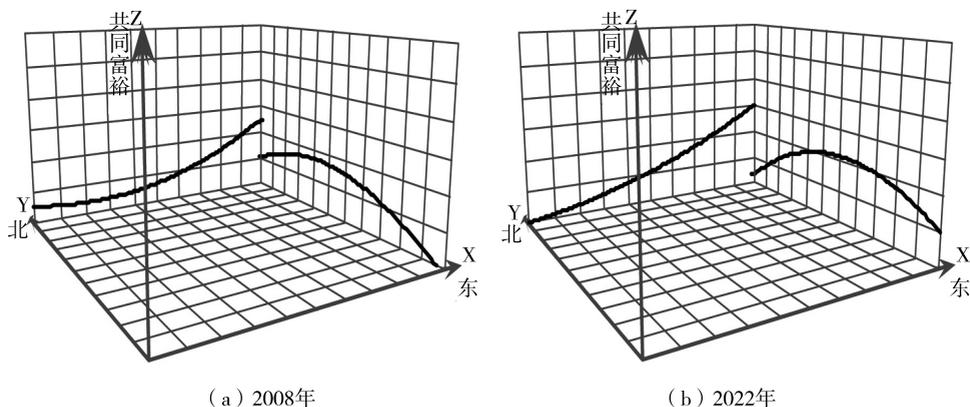


图 1 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测算数据绘制。

本文进一步对共同富裕的空间集聚特征展开分析。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在邻接权重 ( $w_1$ )、地理距离权重 ( $w_2$ ) 以及经济地理权重 ( $w_3$ ) 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对共同富裕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测。三种权重矩阵定义分别如下：如果两省具有相邻行政边界，则  $w_1$  赋值为 1，反之，将其赋值为 0； $w_2$  以两省之间距离的二次方的倒数进行赋值； $w_3$  综合了地理距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具体做法为将两省间的人均 GDP 绝对值差值乘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表4反映了共同富裕全局莫兰指数 (Moran's I) 的测算结果, 可以发现不同年份、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全局莫兰指数全部显著为正, 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可见, 共同富裕在空间分布上并非独立, 而是呈现空间正自相关特征, 这说明在省域层面共同富裕的发展存在空间集聚的特征。

表4 共同富裕的全局莫兰指数测算结果

年份	w1				w2				w3			
	I	sd (I)	z	p	I	sd (I)	z	p	I	sd (I)	z	p
2008	0.1950	0.1010	2.2650	0.0120	0.5480	0.1240	4.7070	0.0000	0.8540	0.2670	3.3210	0.0000
2010	0.1710	0.1020	2.0080	0.0220	0.4900	0.1250	4.2070	0.0000	0.8220	0.2690	3.1790	0.0010
2012	0.2240	0.1050	2.4730	0.0070	0.5150	0.1280	4.3010	0.0000	0.8870	0.2760	3.3360	0.0000
2014	0.2510	0.1050	2.7230	0.0030	0.6050	0.1280	4.9970	0.0000	0.9500	0.2770	3.5560	0.0000
2016	0.2260	0.1050	2.4820	0.0070	0.5320	0.1280	4.4130	0.0000	0.9100	0.2780	3.4010	0.0000
2018	0.2720	0.1050	2.9270	0.0020	0.5430	0.1280	4.5230	0.0000	0.6200	0.2760	2.3690	0.0090
2020	0.3690	0.1070	3.7870	0.0000	0.5790	0.1300	4.7200	0.0000	0.5070	0.2810	1.9260	0.0270
2022	0.3270	0.1060	3.4090	0.0000	0.6150	0.1300	5.0140	0.0000	0.6870	0.2800	2.5750	0.0050

资料来源: 笔者测算。

以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例, 共同富裕的莫兰散点分布如图2所示, 其中, 横轴z是每个区域的观测值减去该区域的平均值, 反映了该区域与整体平均水平的差异; 纵轴Wz是z的空间加权平均值。由图中象限分布来看, 大部分省份主要分布在一、三象限, 分别属于“H-H”集聚与“L-L”集聚, 意味着中国共同富裕的空间分布存在正向集聚特征。具体地, 处于第一象限 (“H-H”集聚) 的省份有6个, 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福建, 这类省份的特征是本身共同富裕水平较高, 其周边省份共同富裕水平也相对较高。该类集聚的空间关联表现为扩散效应, 即共同富裕优势省份对劣势省份存在正向扩散, 从而产生一种缩小地区间共同富裕差距的动态趋势, 因此该集聚区又称扩散效应区, 整体来看东部地区是主要的扩散效应区。位于第二象限 (“L-H”集聚) 的省份有河北、安徽、江西和海南4个省份, 这类省份本身共同富裕水平较低, 但周边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则较高, 该集聚区又称过渡区, 区内各省份的共同富裕建设水平将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逐步过渡。位于第三象限 (“L-L”集聚) 的省份有17个, 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

和新疆，该集聚区主要以中西部广大省份为主，这些省份的特征是本身共同富裕水平不高，其周边省份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也相对不高。该集聚区又称低速增长区，区内各省份共同富裕的推进与发展普遍较为缓慢，因此，该集聚区是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优先发展区。广东、山东与重庆则位于第四象限，该象限属于“H-L”集聚，其特征为本身共同富裕水平较高，但周边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则较低，其空间关联表现为极化效应，反映出广东、山东以及重庆在共同富裕推进的过程中，利用自身区位优势，通过在规模发展和集聚发展中不断积累有利因素，最终形成了极点的自我发展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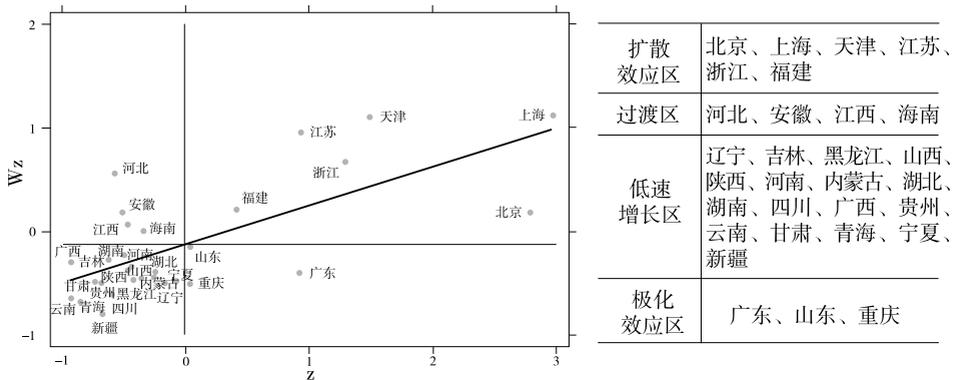


图 2 共同富裕的莫兰散点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测算数据绘制。

需要注意的是，重庆虽然当前位于第四象限，但其紧邻第三象限，具有向低速增长区滑落的潜在风险。通过前文可知，重庆处于进步型阶段，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层面已经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在共享性特别是可持续性层面面临重大挑战。该地区需要加大在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改进力度，强化社会共享机制。在可持续层面，则应继续推动经济结构从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转型，以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和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加大对绿色技术和可持续产业的投资，减少环境污染，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重庆相比，山东省位于第一和第四象限交界且临近原点，该省份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山东省在共同富裕建设中表现出独特的平衡性，其在富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大维度的全国排名均在第 10 名左右浮动。这一现象反映出山东省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山东经济总量庞大，产业基础扎

实，但在转型升级、资源分配和环境保护各方面都面临很大挑战。山东省应在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减少对传统重工业的依赖。同时，加大对环保技术的投入，推广绿色生产方式，确保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从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实现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此外，山东省还需加大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投入，推动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加强社会共享机制。通过这些措施，山东不仅能够巩固其在富裕性方面的成就，还能在共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实现全面进步，从而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全国格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 （二）共同富裕的区域分布差异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对三大地区共同富裕的发展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由图 3 可知，考察期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在 0.3701 ~ 0.4323 范围波动，平均取值 0.4048，所在维度远高于中部、西部地区，显示出该地区在经济建设、社会共享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显著区域优势。从发展趋势看，三大地区共同富裕指数均表现出向高维度跨越的趋势。其中，中部地区以 1.15% 的年均增长率快速提升，整个考察期提升了 17.28%，是三大地区中提升速度最快、提升幅度最大的地区；西部地区增长最为缓慢，年均增长率仅为 0.48%，显然该地区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这种区域发展差异背后涉及多种因素，如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政策支持、资源分配、教育和技术水平等。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区域发展策略，促进共同富裕在各区域得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三大地区的这种增长趋势并非恒定的，特别是在 2020—2022 年阶段，共同富裕指数波动性显著加大。其中，东部地区在 2020—2021 年间开始出现连续下降后在 2022 年反弹回升，在此阶段共同富裕指数共下降 2.56%；中部地区在此阶段则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降幅达到 6.31%；西部地区呈现出相反的发展态势，2020—2022 年该地区共同富裕指数持续上升，共计增长 6.78%。也就是说，在新冠疫情期间，中部地区共同富裕的推进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而西部地区在此期间则实现了稳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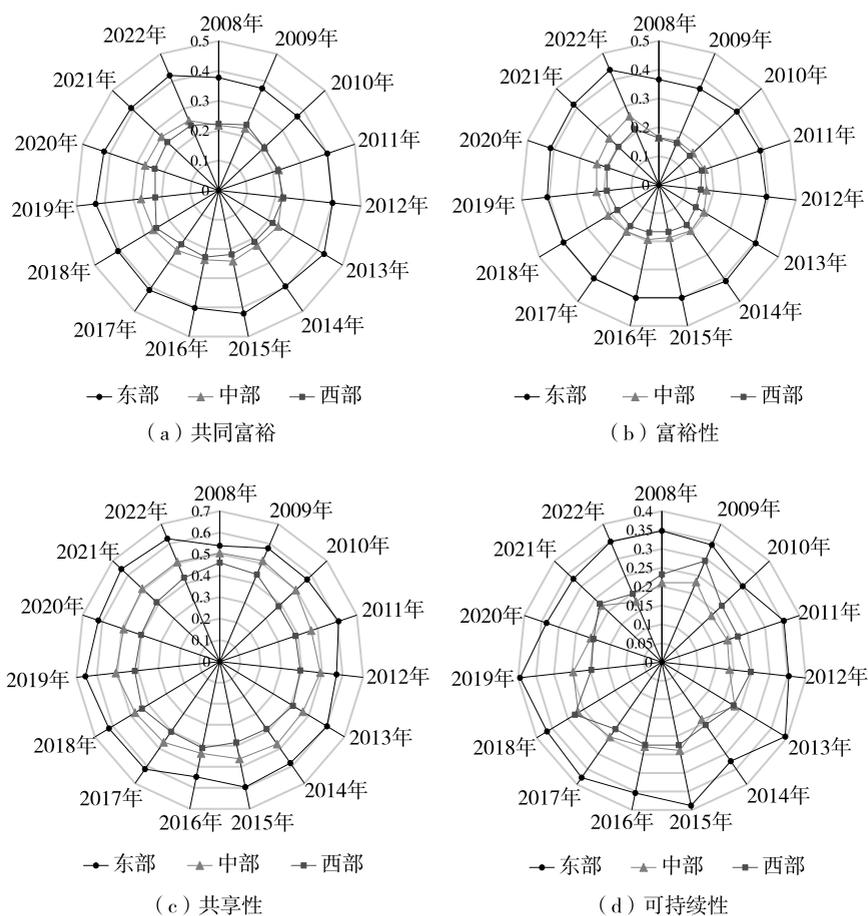


图3 三大区域共同富裕及其分解指标的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测算数据绘制。

从共同富裕的各分解指标来看，在富裕性维度，东部地区富裕指数介于 0.3653 ~ 0.4369 之间，考察期平均值为 0.3988；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富裕指数平均得分仅为 0.1994 和 0.1731，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在考察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富裕水平分别实现了 19.41%、58.16% 和 30.37% 的增幅，中部地区富裕水平提升速度最快，显示出该地区近年来在经济发展策略和公共服务改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地，三大地区富裕指数在 2020—2022 年间均未出现任何下降倾向，这反映出尽管经历新冠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中国各地区经济依旧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势头。在共享维度，东部地区虽然同样处于最高维度，但地区间的差异显著下降。这显示出虽然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等物质财富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三大地

区在提高社会共享、缩小社会差距等方面均实现了长足进步。这一发现强调了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策略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虽然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挑战，但通过有效的政策调节和资源配置，可以实现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所有地区和社会成员。需要指出的是，三大地区共享指数均在 2020 年出现显著下降，东部地区在 2021 年短暂回升并在 2022 年再次回落，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在 2020 年之后实现反弹并持续回升。可见，对于三大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更应该注意疫情及贸易摩擦在社会共享层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可持续维度，考察期东部地区可持续指数小幅提升 0.46%，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下降 16.68% 和 14.85%。事实上，东部地区可持续指数从 2020 年开始显著下降，其中 2020—2021 年下降幅度高达 16.46%；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在更早的 2019 年便开始了持续性的下降，整个 2019—2022 年阶段中部地区下降 34.27%，西部下降 27.7%。结合前文，可以发现中国共同富裕进程在这一特殊时期可持续性维度的下降是涵盖全区域的，特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下降尤为显著。

#### 四 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分解

在明确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下面进一步通过达古姆基尼系数及其分解要素对共同富裕空间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析。图 4 反映了该基尼系数走势及各分解要素占比情况，可以发现，共同富裕总体基尼系数介于 0.1841 ~ 0.2314 之间，整体波动幅度不大。考察期基尼系数由 0.2165 下降至 0.2057，整体降幅约 4.59%，可见，中国共同富裕总体差异以较为缓慢的速度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共同富裕总体基尼系数在 2008—2017 年间以 0.42% 的年均增长率实现增幅 3.8%，2018 年基尼系数显著下降并达到历史最低值 0.1841，2019 年基尼系数快速反弹并在 2020—2021 年间持续回落，2022 年则再次呈现向上拉升态势。可见，2018 年之前中国共同富裕的发展差异虽有所扩大，但整体保持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在 2018 年之后共同富裕的发展差异波动性变大。

通过对达古姆基尼系数分解的分析可以揭示中国共同富裕空间差异的构成与来源。从图中可知，共同富裕总体差异的各贡献要素中，区域间差异贡献最大，其贡献占比维持在 59.75% ~ 74.18%，平均贡献 66.98%，可见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此外，区域内差异平均贡献占比 24.59%，而超变密度占比仅约 8.43%，这表明超变密度对中国共同富裕总体

差异贡献最小，意味着区域交叉问题对共同富裕区域差异化的影响不大。综上可知，共同富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是区域间的差异，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是解决共同富裕非均衡问题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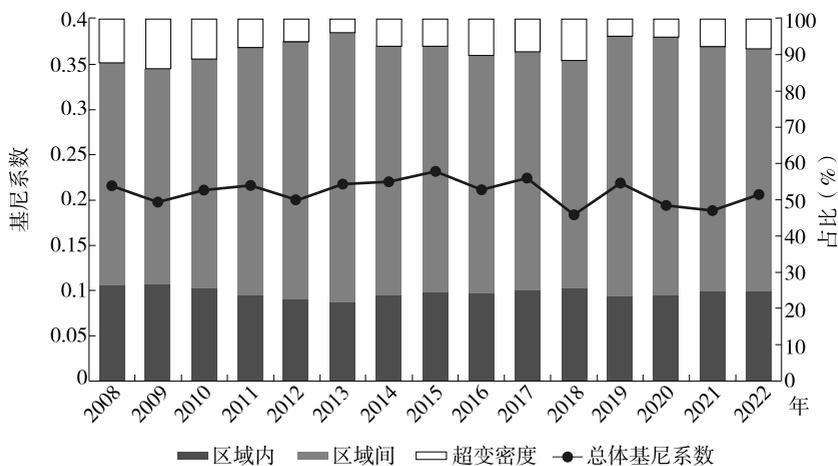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共同富裕的总体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测算数据绘制。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重点针对共同富裕的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进行讨论。由图 5 可以发现，东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所处维度最高，东中部紧随其后，且二者远高于中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反映出东部和中部、西部的发展差异显著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格局。造成这种区域间显著差异的潜在原因是东部地区凭借其开放的经济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产业集聚度，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为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产业基础和发展策略等因素的差异，其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快速发展。相比之下，中西部区域间基尼系数平均得分仅为 0.1038，两地区共同富裕差距相对较小。从发展趋势来看，考察期各区域间基尼系数整体表现为平稳发展的态势，其中，东中部基尼系数下降 10.12%，是唯一存在下降趋势的一组地区。事实上，考察期各区域间基尼系数并非持续平稳，特别是在 2018 年之后基尼系数的波动性明显增加。具体地，各区域间基尼系数普遍在 2018 年出现显著性下降后在 2019 年回升，在 2020—2021 年间连续下降并在 2022 年再次回升。从图 5 可知，东西区域间基尼系数波动性最大，其次为东中部地区，中西部基尼系数波动性最为平缓，也就是说，在新冠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历史特殊时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东

西区域间共同富裕均衡发展的影响最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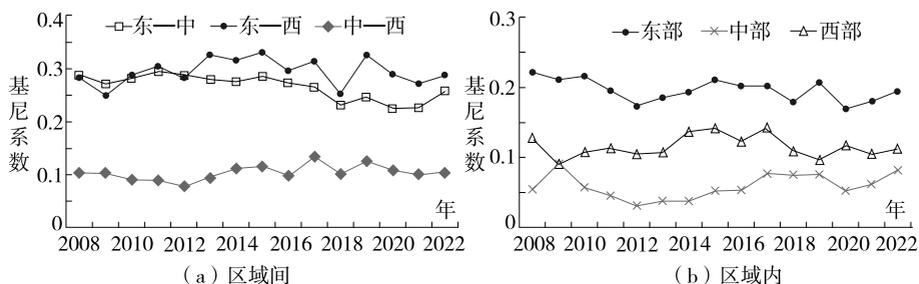


图5 共同富裕区域间基尼系数和区域内基尼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测算数据绘制。

从区域内基尼系数来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所处维度最高，整体在0.1692~0.2208的区间范围波动，平均值为0.1957，意味着东部地区区域内共同富裕的非均衡问题尤为严重，而中部地区基尼系数平均得分仅为0.059，考察期始终处于最低维度，表明该地区各省份间共同富裕的发展最为均衡。从发展趋势来看，样本考察期东部和西部区域内基尼系数分别下降12.18%和11.57%，而中部地区上升49.45%，即东部、西部区域内各省份共同富裕的绝对差异缩小，而中部省份间的差距显著扩大。特别地，东部地区基尼系数在2019年显著上升后，于次年下降至历史最低值，随后在2021—2022年间持续上升；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西部地区则在2019年达到极低点后呈现“上一下”波动式缓慢上升的发展态势。相较于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波动幅度更大，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新冠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战等叠加影响对这两大区域共同富裕的均衡发展影响更大。这是因为东部和中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其对外贸易依赖度较高，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因此，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和中美贸易战等因素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均衡性构成了显著冲击。此外，政策制定者需要警惕的是，疫情发生以来，特别是2020年之后东部和中部省域间共同富裕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来源于各省份在产业结构、经济韧性以及对外开放程度上的不同。政策制定者需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加大对受影响较大省份的支持力度，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并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协作与资源共享，从而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的均衡提升。

## 五 共同富裕的收敛趋势及影响因素

收敛性分析是判断共同富裕不同地区之间差距变动情况的理想模型<sup>①</sup>。针对共同富裕的收敛性特征，在借鉴有关研究思路<sup>②</sup>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传统绝对  $\beta$  收敛进行检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本文进一步通过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各区域空间收敛模型的空间滞后系数  $\rho$  在统计上均至少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即各区域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选择空间收敛模型来研究各区域共同富裕绝对收敛的情况。具体来看，在全国空间收敛中，收敛系数  $\beta$  为  $-0.6259$  且在统计上满足 1% 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共同富裕的增长与初始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共同富裕存在绝对  $\beta$  收敛。同样地，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传统收敛模型中  $\beta$  收敛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三大地区共同富裕都存在绝对  $\beta$  收敛。从收敛速度看，全国共同富裕的收敛速度为 7.02%，其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达 13.47%，东部与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分别为 4.36% 与 2.52%。整体来看，各地区共同富裕均存在绝对  $\beta$  收敛，且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

表 5 共同富裕绝对  $\beta$  收敛的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传统收敛				空间收敛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beta$	-0.6621 *** (0.0492)	-0.4800 *** (0.0714)	-0.5984 *** (0.0981)	-0.8276 *** (0.0913)	-0.6259 *** (0.0483)	-0.4568 *** (0.0945)	-0.2976 *** (0.1126)	-0.8483 *** (0.0898)
$\rho$	—	—	—	—	0.3196 *** (0.0087)	0.4437 ** (0.1946)	0.1382 * (0.0819)	0.2531 * (0.1343)
$R^2$	0.3717	0.3857	0.3854	0.4854	0.3020	0.2553	0.2516	0.3952
$s$	0.0775	0.0467	0.0652	0.1256	0.0702	0.0436	0.0252	0.1347
$\tau$	8.9433	14.8386	10.6379	5.5196	9.8686	15.8991	27.4759	5.1449
控制变量	NO							
时间效应	YES							
空间效应	YES							

注：括号内数字报告了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① 龚斌磊等：《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 年第 12 期，第 5-26 页。

② Z. Cheng, J. Liu, and L. Li, “Research on Meta-Frontier Total-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nd its Spatial Convergence in Chinese Provinces”, in *Energy Economics*, Vol. 86, 2020, p. 104702.

绝对 $\beta$ 收敛以各地区具有相同外界影响为假设前提，考虑到各地区要素禀赋和基础条件的差异，共同富裕的收敛特征可能因外部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本文在充分考虑科技创新投入 ( $rd$ )、产业结构高级化 ( $idstr$ )、市场化进程 ( $mkstr$ ) 以及对外开放 ( $open$ ) 等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共同富裕的条件 $\beta$ 收敛特征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相较于绝对收敛，在考虑外界影响因素后，除了全国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空间收敛模型中滞后系数 $\rho$ 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对这些地区仍使用传统收敛模型，而对全国层面则选择空间收敛模型进行分析。具体来看，全国共同富裕的条件 $\beta$ 收敛系数为 $-0.7389$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考虑外界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全国共同富裕存在 $\beta$ 收敛。从三大地区看，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beta$ 收敛系数分别为 $-0.6241$ 、 $-0.7676$ 和 $-0.8873$ ，可见这些地区 $\beta$ 收敛系数同样显著为负，也就是说三大地区共同富裕也都存在条件 $\beta$ 收敛。从收敛速度看，三大地区里西部地区收敛速度最快，收敛周期最短；东部与中部地区的收敛速度则相对较低，收敛周期也相对较长。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绝对收敛，全国与三大地区收敛速度均大幅提高，反映出科技创新投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外界要素加快了各地区共同富裕的收敛进程。

表6 共同富裕条件 $\beta$ 收敛的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传统收敛				空间收敛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beta$	-0.7436 *** (0.0497)	-0.6241 *** (0.0797)	-0.7676 *** (0.0962)	-0.8873 *** (0.0888)	-0.7389 *** (0.0485)	-0.9642 *** (0.1550)	-0.8495 *** (0.2504)	-1.2142 *** (0.1625)
$\rho$	—	—	—	—	0.3202 *** (0.0089)	0.1785 (0.2088)	0.0610 (0.0941)	0.0612 (0.1426)
$lnrd$	0.1008 *** (0.0356)	0.1618 *** (0.0503)	0.0346 (0.0632)	0.0678 (0.0741)	0.0811 ** (0.0336)	0.2520 *** (0.0871)	0.0924 (0.1452)	0.3312 ** (0.1527)
$lnidstr$	0.1323 *** (0.0314)	0.0626 (0.0471)	0.1647 *** (0.0466)	0.1181 (0.0770)	0.0982 *** (0.0344)	0.2109 ** (0.0925)	0.1898 * (0.0858)	0.2847 ** (0.1217)
$lnmkstr$	-0.0362 (0.0733)	0.0191 (0.1000)	-0.2194 * (0.1086)	0.1573 (0.1939)	-0.1351 (0.0883)	0.2231 (0.2251)	-0.1368 (0.1787)	0.8398 *** (0.3279)
$lnopen$	0.0498 ** (0.0201)	0.0064 (0.0392)	0.0656 (0.0433)	0.0574 * (0.0324)	0.0671 ** (0.0293)	0.0450 (0.0647)	0.0880 (0.0896)	0.0955 (0.0597)
$R^2$	0.3685	0.3164	0.3930	0.4263	0.3278	0.3860	0.4010	0.3655
$s$	0.0972	0.0699	0.1042	0.1559	0.0959	—	—	—
$\tau$	7.1299	9.9167	6.6499	4.4455	7.2259	—	—	—
时间效应	YES							
空间效应	YES							

注：括号内数字报告了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

外部要素对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发展存在不同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可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共同富裕向高水平跃升，这一影响在东部地区尤为显著。如刘思明等人指出，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促进生产力的提升和新技术的应用，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sup>①</sup>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还能提升劳动力技能和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地区间和社会内部的收入差距。事实上，科技创新对教育、医疗和交通等社会保障系统的优化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引入先进技术和和管理方法，可以提高这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确保更广泛的群体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福祉。此外，科技创新还是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力。<sup>②</sup>通过发展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和可持续产业，不仅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产业升级在促进全国共同富裕提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转型升级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从而激发新的经济动能，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三大地区里面，中部地区产业升级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最为显著，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并不显著。潜在原因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出现技术替代现象，如大规模采用人工智能可能减少对传统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劳动人群的议价能力，导致工资下降或失业，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sup>③</sup>因此，在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时，需要关注这一过程可能诱发的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第三，现阶段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一般而言，市场化改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然而，有研究指出，现阶段中国有些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垄断、市场性垄断等现象，产权保护以及市场准入等隐形壁垒尚待消除。<sup>④</sup>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的限制，市场机制的完

① 刘思明等：《国家创新驱动力度及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3-23页。

② 尚勇敏、宓泽锋：《长三角低碳技术创新合作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10期，第135-145页。

③ 房连泉、毛冰雪：《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路径——基于就业市场新形态的研究综述》，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82-98页。

④ 田学斌、李治宇：《深化市场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2期，第1-5页。

善程度较低，导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并不显著，甚至会适得其反。

第四，对外开放可以显著推动全国共同富裕的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技术创新与知识传播，从而加快经济增长并促进福利的普及。需要指出的是，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工具，其效果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异质性，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推进对外开放策略时须考虑地区特性和差异性，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及共同富裕的协调推进。

##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富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 2008—2022 年间中国 30 个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在揭示出共同富裕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利用达古姆基尼系数对共同富裕的空间差异构成及其来源展开分析。最后，本文从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两个方面对共同富裕的收敛性进行检验，并对相关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现阶段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实现了持续提升。在共同富裕的分解维度中，富裕性的发展速度和提升幅度最为显著，共享性则是三大维度中得分最高的分解指标，显示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此外，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在 2019 年之后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共同富裕在这一特殊时期出现小幅下降。

第二，全国共同富裕的发展存在“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不同省份间则呈现出正向集聚的分布特征。其中，东部省份主要为“H-H”集聚，其空间关联表现为扩散效应；中西部省份则主要为“L-L”集聚，这些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普遍不高，成为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发展的地区。从三大维度来看，东部地区在富裕性、共享性以及可持续性维度均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在富裕性维度的领先优势最为显著，在共享性维度则最小。

第三，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呈现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其次为区域内差异。无论是区域间差异还是区域内差异，在 2019 年之后波动性均显著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共同富裕的总差异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也就是说新冠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对中国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其并未产生根本性变化。此外，全国与东部地区共同富裕

的发展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但这种极化特征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

第四，共同富裕具有典型的收敛性特征，但各地区的收敛速度与收敛周期存在较大差异。从影响因素看，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市场化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外界因素对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直接影响存在差异，但普遍加快了各地区共同富裕的收敛速度，缩短了收敛周期。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首先，深度解放新质生产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注入内核驱动力。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促进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支持高效率生产体系的构建，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不仅可以加速经济转型，同时也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确保社会财富的稳步增加。

其次，围绕共同富裕建设的不平衡问题，着重缩小地区发展差异。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对中西部和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扶持。例如，可通过引入高科技和创新型产业，提高这些地区的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投入，确保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此外，促进不同省份间的经济协作和资源共享，特别是在技术转移、资本流动和人才交流等方面，通过区域一体化战略建立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实现各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

最后，聚焦现代化新时代命题，打造可持续的共同富裕。鼓励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向更加环保和资源节约型转变。政府应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限制，逐步提高能效要求，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为愿意向绿色转型的企业提供转型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建立绿色生产体系。此外，鼓励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如金融、信息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领域的发展，通过政策优惠吸引更多投资进入这些行业；支持高技术产业园区和创新平台建设，通过集聚效应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不仅是应对当前环境恶化的关键，也可为未来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徐睿)